全球化与教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全球化与教学：彼此之间的特殊挑战*

当今的“全球化”有这样一个神话，即在经济势力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

——Hirst and Thompson 1998: 6

导　论

虽然“全球化”的说法只是近十年才流行起来，但是，作为欧美传统中的帝国理想，全球化现象本身，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其时，教会改革的宣言中，有一条便是新的人间天堂已经作为政治现实存在了（Loy, 1999）。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个人主义、个人自主、个人利益成为神圣美德和新经济学的基础，受到大力推崇。至 17 世纪，财富积

* 原文为“The Specific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for Teaching and Vice Versa”，本文为作者在首届“课程研究国际化大会”（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rriculum Studies Conference）上提交的论文。

累成为上帝恩宠和道德高尚的象征，而贫穷则是懦弱和缺乏个人自律的标志（Weber，1920；Tawney，1926）。然而，因帝国总是依赖于统治意志而存在，所有被统治者往往寻找各种反抗之道，其结果颇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未来地缘政治现实的形态，正在当今这些势力之间的争斗中形成。

首先，必须指出国际贸易（不同文化和集团之间的贸易）与全球化之间有一重要区别。前者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项活动，而后者作为一个按共同的规则进行操作的全球统一的贸易网络，即所谓的“无边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则是较近的、议论纷纷的现象。在这些过程中，教育和教学一直起着由其受政治领域内流行的主导思想和梦想规定的性质而决定的作用，因为当权者总是力图通过青少年的心灵使现在平稳地走进未来。

本文试图将全球化与教学这两者保持在相互对话的格局内，而避免当今常见的那样将两者对立起来。那些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甚至地方和国家政府推行全球化的人，在制定其教育政策的时候，很少考虑教师的经验。教师只不过是些公仆，其职责是将别人作出的决定付诸行动，“传递别人的邮件”——诚如课程理论家威廉·派纳（William Pinar，1998）所言。的确，今天教师个人和集体之所以躁动不安，大多是因为渐渐认识到在当今教育决策中，教师毫无权力。而教师反抗全球化势力，尤其是反对教育事业商业化和技术化的呼声，在另一方听来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尖叫。这一方谴责教师既忽视了自己作为普通公民在生活中参与全球

化进程的同谋关系，又忽视了其历史地形成的为较大的秩序服务的责任。作为教师，既然你拥有共同基金，享受着附近超级市场琳琅满目的优质货物，激动于自己驾驶的跑车的引擎声，那么，你反对全球化势力的呼声是不可能具备道义或理智的权威性的。

非也。如今要做的，正是更为大力、开放地检讨全球化现象的历史构成，更深刻地剖析大家是怎样都卷入其运作之网的——无论各人的政治立场如何，都应努力去建构源于教学之核心的教师的反应，因该反应是源于对可能的生活条件的意识。教师的这一独特视角，在任何关于共享的未来的讨论中，将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认为，今日的教师和教学均陷入政治和认识论危机之中。因为在过去五十年左右西方传统所发生的认识论革命（从稳态的硬科学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向诸如后现代流动性、混沌说、建构主义和生态学等受相对性驱动的范式的转变），并没有在启蒙运动理性最后的堡垒，即经济学这门沉闷科学中，得到认同，至少在其主要结构上是如此。其结果，渐渐出现如下深刻的破裂：一方面已造就了新型的、对于人类社会内部的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以及与自然界的互联性)的深刻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强硬的经济学对生活作出的解释，依然从较老的理想出发，该理论恰恰与前面所谈的新型认识论相反，即强调主客分离、极端的个人自主构想、政治（如今与经济学合二为一）与历史的分离（这一点的后果尤其严重）。今天，经济可能蓬勃发展，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反而下降。对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权者自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原因在于若真地看到该分离、让其进入人们的认识范围中，势必引发出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根本无法解决的信任危机。从全球范围看，新旧秩序恰成“此生彼灭”之势(这种“生灭”甚至可能是彼此关联的），同时，没有一种解释框架、一门共同语言能将事物组成一个整体。事实上，到底是否需要这样一个框架或语言，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充当其可能的源泉，已成为当今两大最有意思的问题。

然而，无论在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水平上，教师们却深深感受到了现时的不确定性及其内在的紧张关系。由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认识论革命的高等学府开设的师资培训课程，愈发围绕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生态学观念组织教学。叙述个人经历、多元文化主义课程、教师作为研究者或解释性探究者以及分工合作等，已经成为标准的师资培训模式的一部分，并被期望在学校和教育体系里发挥作用。可是，学校和教育体系原先是为了服务于与现在不同的、陈旧的、得到更明确界定的秩序而设计的，该秩序如今从政治上讲依然故我，但其概念的和现实的基础结构本身，具有可疑性并且正在身不由己地发生转变。为稳定的国家服务、造就体面的公民、为商品化了的普通教育而教育等等这些传统的、勉励式的想像，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教师意味着并且能够意味着什么？假如这些想像曾经起到为教师这个职业安身立命的作用，并且为之提供了公共道德权威的话，那么，当国家变成了某种动态叙述（dynamic narration），将其公民仅仅当成资本来源建构，而教育完全成为职业培训时，哪里有教育安身

立命之处，且其道德权威又从何而来？于是，教师们发现自己于同一时刻生活在新旧两套想像之间，而这样一个地方是难以为生的。

因此，本文先简要追溯当代全球化现象的历史构成，以及在这些现象中教学和教育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而试图阐明教师的工作怎样能够开拓一片开放的空间，在这片空间中，教学怎样在处理好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的同时负责任地展开。

全球化现象的构成

赫尔德(David Held)及其同事们(1997：258)所言极是："全球化并非一种独特状态、一个线形过程或社会变革的最终点。"此说触及到几大问题。例如，有些人当真将全球化视为某种具体而独特的状态，一种即便不是事实，至少是想像的和梦想的、左右着现时的一切实践的状态。这一点尤其见于美国的自我理解中。作为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于 1997 年向哈佛大学应届毕业班作的讲演中宣称："今天，我要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必要留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体系之外……每个国家，只要它谋求参与进来并愿意尽其所能地自助，将会得到美国的帮助，找到惟一的正确道路"(Spring，1998：8)。

这个梦想与二战以来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努力一脉相承，只是时至今日依然这么讲，很大程度上显得不合潮流，

并因此而极具危害性。该梦想根本忽视了一些基本事实：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乃是它开发新大陆文化形成的时空观的结果，该文化重地理而轻历史，将世界其他地方仅仅视为空间征服的对象，很少顾及别人的历史感（Campbell，1988）。而且，诚如格雷（Gray，1992：2）所讲，美国乃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启蒙主义政权”——其意是说 18 世纪提出的“理性乃寰宇和平的条件”一说，至今依然鲜活在美国新自由派经济理论的说教中。这套理论被奉为合乎理性的科学（reasonable science），而事实上，类似的理论，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宣告其彻底破产。努力崛起的民族认为它掠夺成性，因而大加贬斥；在二战后欧洲社会契约的大气候中，它站不住脚；而在亚洲，它则与在亚洲国家的众多定义中起重要作用的、根深蒂固的家庭责任感背道而驰。

如果全球化不是特定状态，那么，怎样才能对它作最佳描述？目前流行的相互作用的诸影响力，乃是以下简要追述的历史演变的结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持的“无边界世界”这一观念，是欧美受到尤其是 19 世纪工业革命启发而围绕生产和消费过程组织资本发展这一传统的自然延伸。正是该传统，导致欧洲以及后来美国因自然资源和市场的需要而进行世界范围的殖民运动。其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教育在康德、黑格尔以及后来达尔文等人的哲学著作中提出并论证的进步和发展的特殊定义下，充当了婢女的角色（Eze，1996；Schmidt，1996）.

大约从 1884 年欧洲列强召开的分割非洲的柏林会议，至 1945 年二战前的世界秩序结构遭到彻底毁灭这个阶段，教育的宗旨主要在于培养一批精英分子，以便在国内外建立并维持该秩序。同时，培训大批人员让他们在行政管理、军事发展和技术培训等具体工作岗位上，为资本和国家机器效力（Carnoy, 1974）。在各殖民地，只对当地人中的极少数实施西方式教育（western style education），将这少部分人培养成当地的领导，而对其他大多数人，则只提供极少数的、目的在于让其充当欧洲主人的苦力大军的教育。

从二战结束至 70 年代这一有时被称为“长期繁荣”（the Long Boom）阶段，从经济发展和教育的角度看，矛盾重重。一方面，欧美推行的是“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让资本发展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期减少似乎是永远摆脱不掉的、随杂乱无章的市场理论而来的繁荣和萧条的周期造成的社会混乱。这套社会责任框架，使得制度化的国家资助的公共教育在各层次一度繁荣昌盛起来。同时，这套做法部分地是为了强化西方的社会力量和稳定，以反抗共产主义这个“可怕的敌人”。其副产品则是造就了作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途径的正规教育的需要。教育被极大地商品化，在教育机会均等法及其他形式的“权利”政治态势下，成为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可以购买的“东西”（Meighan, 1981）。教育的这一特定理想，如今正在消亡。

在各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成功地争取到了政治主权，但是，业已取得统治地位的、产生新局面的各种机制很快显示出

旧秩序以众多微妙而深刻的方式顽固坚持固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况部分地是因为傲慢、部分地是因为无知造成的。昔日的殖民地到处安置好了地方傀儡领导，以保证继续拥有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使用权。“教育”的定义大多依然囿于西方模式，虽然西方模式在解决各地问题的适切性方面值得怀疑（Coombs, 1989），不仅如此，各国对教育的定义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类机构的发展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视为向全球各民族统一网络迈进的早期迹象。

这个时期还有一大特征，即各文化之间的新式互动。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众多满怀理想的青年大学毕业生，受世界大学服务委员会（World University Service Commission）、加拿大大学海外服务部（Canadian University Service Overseas）、海外志愿服务组织（Voluntary Service Overseas）和和平组织（Peace Corp）等派遣，前往昔日殖民地从事教学。对于参与这些项目的欧美青年而言，这类经历往往教育他们认清了自身传统中民族优越论（ethnocentrism）的面目。与此同时，大批移民，包括众多求学人员在内，纷纷从殖民地涌入昔日的帝国中心。这两种从相反的方向，即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中心的运动现象，为西方高等院校 60 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认识论革命，即举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大旗进行的所谓“后”革命（“Post” revolution）（McClintock：1997），作出了重要贡献。

追根溯源，西方这场“后”革命从思想上讲兴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包括弗兰兹·范农（Franz Fanon）在内的阿

尔及利亚学者以及后来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Francois Lyotard）和西苏（Helene Cixous）等人的著作（Fischer，1992）。这批学者向西方的认识（episteme）原则和结构发起挑战，指控它应该对全球范围内仍在继续的西方经济、文化和政治霸权负责。他们表明，该认识是怎样完全通过与他者（an Other）（其他民族、文化、集团、神）之间的无声的依赖性关系得以构成并维持的，现在该是那些他者讨债的时候了。这一提法使得西方的学术工作自那时至今陷入认识论危机中。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身份（Identity）的意义、“人”的本质、知识中的权威问题、作为文化产物的科学、课程中的种族和性别偏见等等。包括教学在内的脑力劳动，将取决于人们怎样创造性地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西方都市的多元文化环境也许尤其如此。

不难理解，在那些认为脑力劳动目的在于满足国家——资本联合体的技术需要的人看来，“后学”（“Post” scholarship）工作是一大威胁。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利特·撒切尔当政期间，大学受到攻击，罪名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破坏现存秩序；在教学中歪曲西方文化形象，认为这种文化形象是人类进步的自然的并业已得到证明的进化顶峰，理应供全人类效法。这两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标志着西方高等院校作为从事自由反思和独立自主的学术工作的场所，开始走向末日，而这个退化过程目前仍在继续。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今日的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构想逐渐得到落实。该过程得力于几大相互关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因素。例如，1971 年欧佩克(OPEC)对世界油价实行控制，这一举动显示出西方工业在非西方利益集团面前的脆弱。在教育领域，到 1972 年，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失利，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为各大学校园发起的反战活动。罗纳德·里根，这位发誓让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安全地延续进新千年的法制和秩序总统，委托有关部门就公共教育现状起草了包括《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在内的一系列报告。这些报告半遮半掩地攻击公共教育，且矛头直指教师和师范院校，谴责教育未能与真正的“全球竞争力”的认识和要求保持一致。像文科以及关于环境、种族和性别平等等社会问题的课程，这类“软”项目(“soft” programs)开始丧失经费来源。

与此同时，欧美企业的基础结构正进入危机阶段。此前在冷战格局中受到美国军事保护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开始腾飞，并对西方工业构成威胁。这些国家和地区遍地皆是的廉价劳动力，与美国和欧洲有严密工会组织的劳动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欧美企业开始转向海外，趁劳动力市场还未调节好的时机大捞一把。新的全球经济竞争，迫使美国企业寻求联邦和州政府新的税收政策保护——既然这些企业的工业加工如今大多不在本土上进行(Clarke, 1997)。

重经济利益而轻社会和文化利益的新税收制度的确立，乃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发生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变化，导致在 1945 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指导下于“长期繁荣”阶段兴旺发达起来的公共和社

会事业逐渐走下坡路。其最基本的转变发生于里根执政时期，是芝加哥大学芝加哥经济学派（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影响的结果。该学派的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idman)推崇弗里德里克·冯·海克(F. von Hayek)的新自由经济理论。海克一弗里德曼学说将市场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Spring 1998: 120－157)，认为市场乃为政府首要关注的对象，且政府的功能正是保护好市场的条件，使其免遭往往被该派学说轻蔑地讥讽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和文化事业的侵犯。“新自由派”的这套逻辑在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结束后，成了神圣信条，而这一系列事件在信奉自由市场的人看来，是“历史的终结”(Fukuyama, 1987)的标志，是真正证明西方经济理论绝对优越性的末世。

公共教育先在英国，之后在美国、新西兰和加拿大阿尔伯塔和安大略两省，开始陷入市场规律的逻辑中，在联邦、州(省)和地方政府的压力下，诸如教育“选择”、“教育一企业伙伴关系”等说法渐渐渗透到教育决策走廊。“全球竞争力”(global competitiveness)这一符咒给公共教育尤其是教师造成更大的恐惧、惶惑，使得学问固有的高尚品质几乎得不到任何尊重。如今，教育必须不断表明其各个专业和课程是怎样服务于市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其称为“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 resource)的教育典范(OECD, 1996)。当人们看出这类做法在摧毁公众利益，因而提出不同看法时，得到的答复是这类具体情况无关于全局。时至今日，有一股跨国界的“统一”课程的势头，旨在生产出一套共同认可的、为满足所提出的全

球体系统一要求的知识、技能和品质，同时，也是强力推行统一的教育体制的方式（Spring, 1998; Barlow & Robertson, 1996）.

如果说市场逻辑已经成为新的执政规则的话，没有任何东西较之电脑和通讯技术革命更好地为该规则的实施保驾护航了。关于这场革命，学界已作了众多论述，此处仅着重强调它对于正在变化的教学和公共教育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正如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 1996）和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1996）等人的优秀调查报告清楚地表明的那样，电脑和通讯技术革命并不仅仅使工作条件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化，引起与之配套的整个生产体系的重构；该革命还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全球动荡，雪上加霜，这既表现在生产体系本身上，又反映在国际金融系统中——该系统如今以一种国际虚拟管理者的形式运作，也许除了国际股民这个影子人口外，它不对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或地方负责。

就生产体系而言，该革命摧毁了独立的、在机构内部活动的旧机构，迫使大批工厂企业关停并转。昔日从头到尾由西雅图或底特律的某一个厂家生产的飞机和汽车，如今由来自世界各地按新式生产合同和讨价还价的劳动契约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而成。生产已呈具有纷繁复杂的国际联合性质的形式，任何公司或国家若作任何变动，必然对众多的、体现出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特征的合作伙伴造成严重影响。全球化生产体系具有的极度竞争性，使环境问题已经与工作条件、女工化、男性幼稚化现象和童工有关的人权问题等，得不到任何关注。

电脑和通讯技术革命还使得国际金融操作能瞬间内完成，商品交易能以虚拟形式进行，其结果使得像巴西、墨西哥、泰国等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不堪股票市场波动的一击。既然商品交易是以虚拟形式进行的，它们对最受这些交易影响的人们和地方几乎不负任何责任。国际金融的持续不稳定，已经广泛波及社会和文化领域。大家为寻找市场份额、为寻求掠夺性的最低商品价格、为在保险和信用等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投机和冒险而竞相追逐。从危及家庭生活的劳动力市场的无序（见 Gray, 1999），到多数农业部门的持续不稳定，这一切对各地的普通公民发生着严重影响。

在教育界，全球化过程造成的普遍不确定性一直在某些方面存在。后现代派就“什么东西可以信心十足地教给学生”这一问题所怀的担忧，如今更因“信心十足地教意味着什么”这一难以理解的问题加剧——尤其是在所谓的新知识经济（new knowledge economy）时代，教学往往被简单还原为如何“管理”教育空间，除了计划和组织技巧外，不需要教师有任何个人才干。在信息崇拜的大气候下，学会认知与学会生存两者之间没有明显关联，即使能够对二者之间的关联有所体悟，也是个人在独自劳动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没有得到教师的任何帮助。而教师为了能够在信息崇拜中苟活下来，也许已经将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或者已皈依于“惟有本质上具备商业价值的事实才是有价值的事实”这一预告性信念。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当今作用于全球统一和分裂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冷战时期旧的两极世界开始崩

溃，隶属于从前旧秩序的民族、部落和种族开始努力争取自己的独立和尊严。此外，“无边界的世界”议程正在引发新式抵抗，既出现了宗教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Marty & Appleby，1995)，又有非政府行动组织在争取恢复对本地生活的地方控制(参考杂志《第三世界复兴》),极力将地方从不可一世的全球市场逻辑中拖拽出来。

全球化小结

全球化作为当代状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作为一种生成力量，全球化是大约从中世纪末教会改革开始，五百年来西方传统的思想和行为发展的延伸（Loy，1999)，这场宗教改革的结果，形成了神圣帝国的幻象，充分体现在新教之“个人利益和财富积累即‘美德’”，的观念中。这类“美德”后来成为号称具有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

2. “帝国”总是意味着与他者际遇。开始时，他者对帝国可能有所贡献，但久而久之会动摇帝国的本质和权威。这一情况清楚地见于当今的局势。欧美帝国正在其原先形成的结构和影响下退化。例如，后殖民批评正在改写着大、中、小学和课程的知识权威规则。一些以前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亚洲国家，自 90 年代末“亚洲危机”以来，正在重组，形成与其并非建立在个人自主神话基础上的儒家和其他形式的智慧传统更加适

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理论（Spring, 1998；《亚洲时报》，2000）。当今全球化现象最显著的特征，并非其单一性，而是其全球互联的本质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3. 重从经济学角度而轻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角度解释人类生活的倾向，已导致国家管理公众生活的权力逐渐退化，如此一来，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越发显得子虚乌有。例如，加拿大的经济正快速地与美国一体化，长此下去，还有什么加拿大身份可言？如果说过去是国家赋予教学以道义和职业权威，那么，当国家本身在衰亡，那份权威又从何而来？时下，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政策并不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而是由诸如世界银行一类的、由私人企业资助的国际智囊团和组织制定（Spring 1998；《加拿大大学教师通讯》，1999；Barlow & Robertson，1996）。一些学者提出，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定（Peace of Westphalia）签订以来对世界组织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民族——国家体系，正让位于新式的全球城市网络（Sassen，1999）。城市将成为人口聚集的中心点，且个人身份借此得以构成。我是埃德蒙顿市人，不是什么加拿大人；我不再从加拿大人的角度，而是从一个在新的全球都市网中拥有一处栖身之地的人的角度，思考自己的未来。这到底是好是坏，只能拭目以待。

4. 通讯和技术革命正在改写物质和思想领域的生成规则。从物质方面看，套着全球竞争力这一紧箍咒的新技术，在西方正改变劳动力的意义，因为终身制工作正被没有什么保障的临时合同工取代（Gray，1999）。国际金融正走向“虚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